

病理学视野下的台港言情小说对读

赵小琪,马 昕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台港言情小说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病理学现象,在小说人物的身上则主要表现为病态人格。这些病态人格主要分为嫉妒性人格、依恋性人格与复仇性人格。台港两地言情小说在表现这些病态人格上各有特点。台湾言情小说侧重于描写恋人之间激烈的情感冲突,对女性在恋爱中所表现出的病态人格表现得更为详尽;香港言情小说则将笔触伸向了激烈的社会竞争,通过社会的冲突来表现现代都市男女身不由己的恋爱特点。

【关键词】台港言情小说;对读;病态人格;嫉妒;依恋;复仇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6873(2009)02 - 0015 - 06

台港言情小说在普通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琼瑶、席绢、于晴、古灵、凌淑芬、梁凤仪、亦舒、岑凯伦、李碧华等言情小说作家的作品更是将这一小说类型带上了又一个高峰。近年来,虽然由于受到网络文学的冲击,传统言情小说已经走出了它的黄金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小说类型将渐渐消失,相反,它仍然拥有大量读者,学界对这一小说类型的研究也热情不减。

但迄今为止,学界对言情小说的研究还不充分。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女性文学、通俗文学传播等视角。由于言情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将全部生活的重心都集中于情感纠葛之中,将人类的恋爱心理通过此类小说特有的透镜放大化聚焦化,情感成为生活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达到了现实中难以达到的极端程度。这种聚焦是言情小说最大的特点和卖点,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聚焦,将原本并不明显的许多病态心理明晰化,人物难以达到心理学所说的“心理和谐”^{[1]212},因此言情小说中便出现了许多病理学现象,有生理上的疾病,也有心理上的某种病态,而究其根本,正如英国心理学家保罗·马丁在他的《病态:压力、心理、行为和疾病》一书中描述过人类的情绪变动是如何引起生理上的疾病那样^{[2]154-169},在言情小说中,生理上

的疾病也大多是由于恋爱时的各种情感风暴引起的心理失衡所致。这使得言情小说的病理学意义大大增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台湾和香港的言情小说由于其特殊的社会环境,远比大陆要发达。因此,将这两地的言情小说做文本对读将是十分有趣的,而将其同置于病理学视野之下,更容易凸显两地言情小说的不同特点。这是本文将台港言情小说置于病理学视野下进行对读的缘起。

一、台港小说中的嫉妒性人格对读

嫉妒是人类常有的心理活动。但普通的嫉妒我们并不能称之为病态,只有嫉妒的感情超过常理,超过正常人类心理承受能力时,嫉妒才成为一种病态。而当嫉妒这一病态心理压倒其他正常心理占据主导地位时,人物的人格便发生了扭曲,成为一种病态人格——嫉妒人格。瑞士心理学家维蕾娜·卡斯特在其著作中提到过,嫉妒引发的焦虑很容易引起心理疾病^{[3]188-192}。在台港言情小说中,嫉妒人格形成的原因有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情感冲突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都可能形成嫉妒人格。言情小说作者多为女性,因而女性的种种心理在言情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描写也更为真实。

在台湾言情小说中,情敌嫉妒成为人物行动

[收稿日期] 2009 - 01 - 07

[作者简介] 赵小琪,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马 昕,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的最大内驱力,是言情小说中嫉妒人格最集中的表现形式。情敌之间的嫉妒随处可见,与对方之间一点微小的差距都会在有情敌关系的人物心中掀起巨大波澜,引起心理学所谓的“评价恐惧”^{[1]1155}。尤其是对于女性,情敌之间的嫉妒足以使人物作出极端举动,甚至以身试法。爱情带来的独占欲使情敌成为人类情感史中接近于永恒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由对同一个人的爱情维系,也因为爱情而变得极端尖锐。在现实社会中,情敌之间的嫉妒同样会引起人格的扭曲,而在将爱情影响无限放大的言情小说那里,这种人格扭曲则成为了一种必然。

在台湾言情小说中,情敌之间的病态嫉妒常常推动着故事的走向。在男女主人公的感情趋于稳定时,总有外来者因为嫉妒而带来麻烦,有时这种麻烦是小小的障碍,越过障碍后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更加稳固,而有时这种麻烦则是毁灭性的,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乃至生命带来灭顶之灾,台湾言情小说常常运用这一桥段来掀起故事的高潮。

在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的《梅花烙》中,被皇帝赐婚给皓祯的公主与被皓祯深爱的吟霜之间便是典型的情敌嫉妒关系。在小说的表层文本中,公主深爱皓祯,因此极端嫉妒得到了皓祯全部爱情的吟霜,想尽办法折磨和侮辱这个情敌,甚至对其实施人身伤害,令她流产。而在文本背后,我们还可以依据文本作出这样的推断:在吟霜极端善良的表层心理之下,也隐藏着她不敢面对公主的嫉妒,公主作为皓祯合法的妻子,享有她所不能享有的一切权利,而这种状况在吟霜的世界中无可改变,因而吟霜将这种嫉妒深藏在意识之下,只留被压抑后表现出的极端善良单纯。在这部小说中,公主的嫉妒使她呈现了一种明显的病态人格,不惜一切试图伤害对方,而吟霜的嫉妒被极度压抑,从而反应生成了极端相反的人格,即无限忍让和善良。

在言情小说的黄金时期,台湾社会的保守程度仍旧远高于香港,这使得男性在家庭中依旧占有不可忽视的主导地位,而女性相对被压抑在家庭内部。但这种压抑很难向身为异性的父亲或儿子发泄,于是母女之间便容易发生激烈的心理碰撞。同时,由于言情小说多由女性作者撰写,这使言情小说对女性心理的描写更加真实直接。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表面化的、激烈的,而母女之间

的关系则趋于两极,不是极端亲密,就是极端冷漠。母女之间的嫉妒被作者无意识地加以掩盖和变形,但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台湾言情小说中存在大量母亲和女儿在同为女性的层面上相互嫉妒的例子。这种母女嫉妒并不一定表现在亲生母女的关系中,也表现在有近似母女关系的年长女子和年轻女子之间,例如在婆媳之间。母女之间的嫉妒同样可能导致毁灭性的结果,或者毁灭母女之间的任何一人,或者通过移情而对旁人造成伤害。本我层面上的嫉妒有让人不顾一切想要毁灭什么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也是女儿通过恋爱逃离家庭的一个原因,这一点在美国心理学家伯格的著作《人格心理学》中表述过^{[1]132-36}。

同样是琼瑶的小说,在《我是一片云》中,宛露便深受孟樵母亲强烈的嫉妒心所害。一方面,孟太太守寡二十多年,被压抑的女性意识在见到青春洋溢不拘小节的宛露那一刻起便猛烈燃烧起来,但站在孟太太的立场上,社会和自己都不允许这种意识的复苏,于是这种复苏被压抑,从而变成了对宛露的仇恨。另一方面,儿子孟樵是孟太太世界中最重要的异性,也是孟太太生活的中心,宛露闯入孟樵的世界并试图将他抢走,孟太太强烈的自我保护欲望促使她更加嫉妒仇恨宛露。孟太太的嫉妒与仇恨成为阻挡孟樵与宛露爱情的最大障碍,她一次次的阻碍和拒绝也使孟樵和宛露两人走投无路,最终造成宛露在顾友岚意外身亡后精神崩溃。孟太太具有典型的病态嫉妒人格,使她在关心和爱的名义下最终将孟樵和宛露逼上绝路。

而在另一位小说家姬小苔的《且伴蔷薇》中,越红与母亲的关系中也存在着相互嫉妒的成分。母亲美丽异常,却不聪明,被继父宠着,待人接物任性宛若三岁孩童,而越红从小深受贫穷和寄人篱下之苦,对从不管柴米油盐的母亲充满了愤怒和无奈,这种愤怒和无奈成为越红成年后对母亲冷淡的原因。而继父(事实上是越红的亲生父亲)对越红的一心宠爱和信赖也在母亲心中引起不满。但这对母女之间的冲突并不剧烈,越红生性冷淡,母亲天性简单快乐,所以两人的关系不像上文中孟樵母亲与宛露的关系水火般不容,而是主动分离避免冲突,将嫉妒的成分深埋意识之下,不让它有机会成长。

反观香港言情小说,嫉妒固然也是两性关系出现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造成重大变故的最大原因却往往不是女性之间的嫉妒,而是男性的背叛和伤害。香港社会竞争激烈、机会众多,这为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提供了爱情之外的广大世界。各种诱惑促使不坚定的男性角色暂时背叛爱情,由此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相对于台湾言情小说来说,香港言情小说中对嫉妒性人格的描述突出表现在姐妹之间或同龄女性之间,情敌关系被淡化,姐妹之间、同龄女性之间的嫉妒关系则被强化。在经济贸易高度发达的香港,姐妹之间或同龄女性之间存在着剧烈竞争,双方境遇瞬息万变,从而引发嫉妒,因此也就造就了香港言情小说对姐妹或同龄女性之间微妙关系的重视。有时这种姐妹关系中同时还存在着情敌关系,显得更加错综复杂,但男性角色在此退居其次,女性间的竞争关系比较突出,因而香港言情小说中的嫉妒也就不仅是因为对同一个男子的争夺,而更多涉及女性自身的种种微妙情绪。自卑情结和自我表露的欲望也使许多无法宣之于口甚至无法明之于心的嫉妒情绪被转移到姐妹关系中间来。

梁凤仪《洒金笺》中,妹妹健如对获得真爱又嫁入豪门的姐姐心如具有一种近乎仇恨的嫉妒,不惜以自身为代价诱感和逼迫姐夫,以此来伤害姐姐。在姐夫去世后,又联合三妹惜如在经济上与姐姐心如争斗一世,甚至不惜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去打击心如的生意。为彻底打倒姐姐心如,甚至为心术不正的金旭晖大开抢夺心如财产的方便之门,即使到最后一切都归于失败,也仍然不肯和心如和解。

在另一位香港言情作家岑凯伦的《天鹅姑娘》中,美玉嫉妒妹妹小丽的美貌,从小就不断说她丑陋,单纯的小玉信以为真,整日为容貌而自卑,留着厚厚的长刘海,不敢以正脸示人。甚至对凯瑞的示爱也躲避再三,直到深爱小丽的凯瑞出事,美玉才最终从嫉妒中脱离,成就了小丽和凯瑞的爱情。

从以上的对读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嫉妒人格的表现上,台湾小说明显更注重嫉妒人格对书中恋情发展的影响,对女性自身心理的注意则较少,有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趋于平面化,较少心理深度。而香港小说对女性自身心理的挖掘较深,女

性之间的各种复杂情感也涉及较多,相对来说人物形象更饱满一些,但在恋情故事的曲折程度上则略逊一筹。

二、台港小说中的依恋性人格对读

相互依恋是所有群居动物的本能,人类也不能例外。相互依恋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与人类其他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情感网络,而在言情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依恋的关系同样被扩大和聚焦,从繁芜的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明显的人际关系和强烈的心理需要。在以情感纠葛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言情小说中,人人都需要对别人依恋和被别人依恋来获得存在感和安全感,而当这种依恋得不到满足或者过分依恋,便会形成病态的依恋人格。

在表现女性的安全型依恋人格上,台湾言情作家喜欢将之表现到极致,将原本在现实生活中被生活表象掩盖起来的病态人格提升到突出地位。通常意义上的安全型依恋是一种较为正常的依恋关系,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完全毫无保留的依恋。这在台湾言情小说中表现得比较极端,爱情的张力在小说中被无限延展,恋爱双方的依恋关系也被无限扩大,于是便形成了病态的依恋关系。女性对男性的过分依恋或男性对女性的过分依恋都会向极端的方向发展过去,而一旦被依恋的一方想要终止这种极端的依恋关系,另一方便会作出歇斯底里的事情。安全型依恋发展到极端便会变成一种灾难,对双方来说都是如此。

在琼瑶小说《一颗红豆》中,第二女主角雨婷的性格便是典型的病态安全型依恋。在没有遇到梁致中前,雨婷对母亲的依恋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她利用自己的病将母亲牢牢束缚在身边,不允许任何外来者闯入母女二人的世界,为此甚至达到了夏寒山所说的“慢性自杀”的程度。而在遇到梁致中之后,雨婷对母亲的病态依恋便全部转移到梁致中身上,母亲被夏寒山抢走再也不会遭到她的阻挠,梁致中成为她世界的中心,雨婷一心一意依恋着梁致中,温柔乖顺,言听计从,将梁致中紧紧束缚在身边片刻不离,也使梁致中觉得雨婷一旦离开了他就再也不能活下去。雨婷是典型带有这种病态人格的角色,这类角色有如寄生植物,必须将感情全部托付在某人身上,并从中汲取活下去的营养。一旦这种寄生关系遭到外来破坏,对她们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在另一位台湾言情作家古灵的《忧郁回旋曲》中,凯琳对夏子冷的情感也属于近乎依赖的安全型依恋。夏子冷的淡漠是造成凯琳痛苦爱情的原因,凯琳将全部身心都交付在夏子冷身上,对方感情的冷暖决定着凯琳生活中的悲喜。而在姬小苔的短篇作品《蓝蝴蝶》中,始终代称以“她”的女主角对男主角也呈现出典型安全型依恋,但不同的是,“她”对男主角的依恋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完全不对男主角表露这种依恋,而是将爱情深埋心底。爱恋如茧,将女主角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她”无私地为男主角奉献温柔和关心,在他结婚时伤心远离,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期,也不过是在梦中与他淡淡道别。这里的“她”将安全型依恋推到了反面,完全不争取现实中的“他”,只是将自己的爱情如殉道般完全奉献。

在香港作家那里,对周边环境的重视使女性并不将目光全部集中在人物感情上,而是喜欢描绘人物为社会洪流所挟裹而难以自控的状态。因此各种依恋人格被伪装和变形,被饮食男女的光鲜外表严严实实覆盖起来。一般而言,香港作家笔下的女性较之台湾作家笔下的女性来说更为独立,有自己的空间,也有保障自己生活的经济实力,因此对男性的安全型依恋较少。相反,她们多多少少对爱情持怀疑态度,因此在香港言情小说中,焦虑-矛盾型依恋和回避型依恋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张小娴的《雪地里的蜗牛奄列》,李澄作为男主角,无论是性格(非常温柔)还是职业(漫画家)都表现出相对阴柔的气质,而非言情小说中常见的男主角类型。方惠枣在与李澄的恋爱中既极力回避对李澄的全身心依赖,又难以割舍李澄的温柔,最终两人还是天各一方,徒留李澄在雪天独自垂泪。

处于焦虑-矛盾型依恋中的人更加敏感,常常被焦虑所左右,容易患得患失。当这种依恋关系趋于稳定时,依恋一方往往对这种稳固的依恋关系表现得毫不在意,而一旦这种依恋关系即将破裂,依恋一方就会顿时为焦虑所左右,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让它恢复稳定状态。香港言情小说中的社会环境往往并不像台湾言情小说中一般单纯,爱情不是主人公生活下去的唯一必需品,所以主人公不能将全部生活寄托在爱情上,因此也就造成了香港言情小说中主人公对情爱的矛盾和焦虑感。

亦舒的中篇小说《她比烟花寂寞》中,姚晶表面上是一位优雅成熟,异常通情达理的完美女性,而在谜底一点点揭开时,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姚晶,一生耽搁在对婚姻的追求和逃避中的姚晶,她少女时代对新生活的憧憬始终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不断进入婚姻又不断退出,表现出对婚姻的矛盾和焦虑心态。焦虑-矛盾型依恋所造成的后果常常是破坏性的,人物的情感很难收放自如,因此也就难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和选择。

香港言情小说对回避型依恋的表现也比台湾言情小说要突出。出现这种依恋类型的人往往害怕受到伤害,因而主动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以强烈的心理暗示回避自己对特定人物的依恋。而一旦对方知难而退,回避型依恋人物便怅然若失,会作出一些反常的举动来弥补自己心灵的空缺。梁凤仪《昨夜长风》中,赛明军爱恋谢适文,但又无法放任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与谢适文的爱情中,因为两人之间不仅有身份和地位的鸿沟,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明军与适文的妹夫曾是恋人,并有一个孩子。因此明军刻意回避着自己对适文的感情,令两人感情一直毫无进展,但当适文为左思程所陷害时,明军又挺身而出,为适文提供坚定的支持。

在对依恋性人格的表现上,台港言情小说各自的侧重点显而易见。台湾言情小说着重描写恋爱中女性对男性的强烈归属感,这使得台湾言情小说中陷入爱情的女性形象大多比较软弱和平面,容易被情感变故所伤害,小说整体表现出一种悲情色彩。而香港言情小说则更多注重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冲突,表现女性在恋爱中难以放弃自我所造成的矛盾和痛苦。香港言情小说中的女性始终对男性怀有疑虑,不肯全心依赖,因此香港言情小说一般表现出了一种女性的自强精神。

三、台港小说中的复仇性人格对读

为了迎合读者阅读期待,言情小说的戏剧冲突极为激烈,恋情冲突和亲情冲突都表现得比现实世界要集中得多。美国心理学家卡伦·荷妮的《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中关于寻求关爱与被拒绝的后果的章节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结果:当人物生活的中心只有情感时,情感的失败就很容易使人物的人格发生严重扭曲,形成病态复仇性的人格^{[4]78-89}。情感受挫后的复仇成为言情小说中与恋情发展并行的另一个主题。在现代法治社会

中,复仇已经不再具有其原始“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含义,而是要求人们在法律的框架内为自己讨一个公道。但在言情小说的世界中,法律并不足以令复仇者内心的仇恨消解,因而复仇便恢复了其原始意义,推动着复仇性人格的形成,而强烈的复仇欲望为它提供着内驱力。

台湾言情小说中的复仇人格较多表现在对情敌或恋人的复仇上,对复仇的表现也十分极端。有时全部情节甚至就是由复仇而起,或由复仇而终。在言情小说的世界中,世界观被简化为恋爱的分分合合,失恋的一方往往觉得自己的世界都一并被毁灭,因此产生强烈的复仇欲望。这是爱情失败后的宣泄,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塔纳托斯”(自我毁灭本能)^{[1]133}在现实中的表现。台湾言情小说中的复仇人格依旧大部分停留在女性身上,恋情失败使这些女性角色难以控制自己内心的报复欲望,因此很容易便演变为魔鬼般的复仇人。如琼瑶《六个梦》的第五个梦“归人记”,美姿与广楠相互伤害,美姿报复广楠的背叛,而广楠最终失手将妻子美姿杀死,两人的结局都极其惨烈,甚至女主角晓晴的人生也被拉入了这夫妻二人命运的漩涡。

在另一位台湾言情作家玄小佛的《她是我妈妈》中,罗平爱上了怯懦又善良的韩梅,罗平的未婚妻佩华因此而倍感屈辱,尤其是在见过既不漂亮又缺乏个性的韩梅之后,佩华对自己在爱情上的失败更加不能容忍。佩华对罗平的爱情不断讽刺,明知轻松放弃罗平更能保卫自己的自尊,但佩华始终难以真正放手。在这篇小说的前半段中,罗平与韩梅的爱情始终在罗平母亲惠珍和未婚妻佩华的报复中颠簸,充满痛苦和危险。在台湾言情小说中,爱情上失败的女子往往容易歇斯底里,不肯对已逝的爱情痛快放手,于是形成了接近于病态的复仇性人格。

在姬小苔的《枫若犹红》中,未婚夫沙慕竹的死令女主角江枫伤心欲绝,她潜心侍奉沙慕竹的母亲秦阿姨,专心工作,拒绝再次恋爱。在慕竹的弟弟,著名音乐家沙慕尘回国并再三向江枫表示爱意后,江枫却无法回报他,反而对他怀有莫名的仇恨。而当两人终于跨过心理障碍结合后,慕尘却告诉江枫他已经结婚,这使江枫对慕尘刚刚燃起的爱变成了比从前更强烈的仇恨,为此江枫不顾慕尘的苦苦挽留,毅然离开台湾,数年不曾回

家。而慕尘的生活从此灰暗下去,失去江枫令他心灰意冷,后来更出了车祸,妻子早逝,自身也留下了终身难愈的残疾。在这里,江枫对慕尘的复仇是彻底远离他,以此彻底打击心存幻想的慕尘,这也间接造成了慕尘此后人生的一片黯淡。

香港言情小说在复仇人格的表现方面则延续着饮食男女身不由己的传统,往往复仇并不能达到最终目的,反而会伤害自己。复仇的对象也并不明确,并不一定是情敌或恋人,而是将目标泛化。这种泛化的复仇观念使复仇者在情感的失败既无法归罪于恋人也无法归罪于自身时,便将复仇欲望移向了拦阻在恋爱之路上的情敌或旁人。但对旁人的复仇很难做到彻底,虽然情感上和心理上旁人都成为了复仇的目标,但在深层心理中,复仇者最想报复的依然是一些不可抗力,或干脆就是做得不够好的自己。对旁人的复仇是为了逃避强烈自责的一种本能行动,一旦复仇情感弱化下来,对旁人的复仇也就不了了之。而且香港言情小说看待爱恨情仇时表现出一种较为豁达的态度,给对方以一定的理解。这种复仇观在许多香港言情小说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张小娴的《三月里的幸福饼》中复仇的情节。更典型的例子则是李碧华的著名中篇小说《胭脂扣》,如花对十二少的爱情使她绝望而疯狂,将十二少叫来自己房间,劝他与自己一同自杀,如果十二少不同意一同赴死,那么她给十二少吃下的大量安眠药也足以杀死十二少。但阴差阳错,十二少被人救活,几十年来苟活于世间,而如花却在黄泉路上苦等几十年,始终不见十二少前来赴约。于是如花重回阳间,想要寻找十二少,在得知十二少当时并未死去后,如花的愤怒达到了极点。男主人公和女友带如花寻找仍旧活着的十二少,如花见到如今的十二少后便自行消失。这里的报复并非是将十二少杀死,让他去阴间陪伴自己,而是看到当年翩翩佳公子的药行十二少,如今却变成了老无所养的可怜老头,如花的复仇假时光之手完成。在另一篇《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对段小楼的求而不得转化为对菊仙的强烈厌恶,不顾后果地想要报复菊仙,但最终还是妥协于时光之下,与段小楼痴缠终生,终是不能相守,也不能再责怪菊仙横刀夺爱。

通过对台港言情小说中对复仇人格不同表现的研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台湾言情小

说的复仇情结更重,对恋人的复仇比较极端,这一方面自然是来源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台湾言情小说角色对爱情的全身心投入,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台湾言情小说迎合年轻读者群所造成的固有特点。而香港言情小说对仇恨和伤害表现出一种宽容态度,一方面也许是香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基督教影响,另一方面,香港言情小说主要的读者群是白领和少妇,因此也决定了香港言情小说难以如台湾言情小说般淡化现实背景,纯粹追求叙事效果。这是由各自写作目的和写作方式不同决定的。

通过将台港言情小说置于崭新的视野——病理学视野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自身具有的不可转移的创作特点,台港言情小说中有着十分明显的病理学特征,而且这些病理学特征通过人物行动左右着情节的走向,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并最终决定人物的命运。通过对台港言情小说在各种病态人格表现中表现出的差异性进行对读,我们发现,台港言情小说在病态人格的表现方面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台湾言情小说在表现情敌间的病态嫉妒,恋人之间女性对男性的极端依恋,恋爱失败后对旁人的复仇方面花费较多笔墨,也因此造

就了台湾言情小说极端悱恻缠绵,情节进展靠外力侵入推动的特点。而较之台湾言情小说,香港言情小说将一部分笔墨分给了社会生活,对女性自立的描写更多,女性之间的冲突突破了情敌这一狭小的空间,而同男性一样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产生冲突,对姐妹之间、同龄女性之间的嫉妒表现得比台湾言情小说更充分。同时,台湾言情小说与香港言情小说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审美取向,台湾言情小说更喜欢将人物的病态人格渲染到一种极致,而香港言情小说作家则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宽容心态。

【参考文献】

- [1] [美]伯格.人格心理学:第6版[M].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 [2] [英]马丁.病态:压力、心理、行为和疾病[M].白卫涛,应译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 [3] [瑞士]卡斯特.羡慕与嫉妒:深层心理分析[M].陈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4] [美]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M].陈收,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责任编辑:郭锡健】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Romantic Novels from Pathological Perspective

ZHAO Xiao-qi, MA 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romantic novels, there are many pathological phenomena, which are highlighted by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There psychopathic personalitie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 jealous, obsessive, and vindi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romantic novels discloses that Taiwan romantic novels focus more on lovers' emotional conflicts, whereas Hong Kong counterparts vicious social competition.

Key words: Taiwan and Hong Kong romantic novels; comparative study;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jealous; obsessive; vindictive